

# 播

王林 著

BOZHONG

# 种

解放军出版社



# 播 种

——散文集

王 林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播种/王林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5

ISBN 978-7-5065-5809-9

I. 播…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293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5)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625

字数:273千字 印数:5000册

定价:35.00元

## 目 录

|                |       |
|----------------|-------|
| 二十九路军下级军官的一封信  | / 1   |
| 孔庆烈士生前谈冀东抗日大暴动 | / 4   |
| 我们的机枪手——崔国昌    | / 22  |
| 忆人民的音乐家——张寒晖   | / 26  |
| 歌曲《松花江上》的流传经过  | / 31  |
| 行动起来!          | / 36  |
| 行动起来!          | / 38  |
| 还不到一整年         | / 40  |
| 播种             | / 42  |
| 支前特等功臣渔工姚金起    | / 59  |
| 忆烈士苏路同志        | / 63  |
| 记陈翕如同志         | / 72  |
| 怀念人民英雄杨连第同志    | / 77  |
| 伟大的友谊          | / 80  |
| 金达莱            | / 91  |
| 人民的儿子          | / 101 |
| 家禽饲养员金凤姑娘      | / 109 |
| 奇妙的爱情          | / 124 |
| 感谢苏联文学给了我力量    | / 135 |
| 毛泽东思想的果实       | / 138 |

|                        |       |
|------------------------|-------|
| 介绍孙犁的《白洋淀纪事》           | / 140 |
| 《白洋淀纪事》的艺术风格           | / 150 |
| 一封难忘的信                 | / 154 |
| 记黄敬同志                  | / 157 |
| 关于黄敬同志二三事              | / 165 |
| 回忆黄敬同志                 | / 174 |
| 开滦大罢工时的林西矿             | / 181 |
| 口琴前的纸老虎                | / 207 |
| 赏菊怀郭宗鉴烈士               | / 210 |
| 回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 / 213 |
| 耿长锁印象记                 | / 219 |
| 油田上的歌声                 | / 225 |
| 两个世界                   | / 232 |
| 忆崔嵬同志二三事               | / 244 |
| 给朱老总讲冀中的故事             | / 247 |
| 今天挤破图书馆的门,明天就要挤破创造发明的门 | / 255 |
| 青岛大学的爱国民主斗争            | / 258 |
| 忆李春亭烈士                 | / 269 |
| 预报了暴风雨的海鸥              | / 274 |
|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 / 278 |
| 有关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的几点情况       | / 287 |
| 何基沣、边章五与“七七”事变         | / 298 |
| 我上的中国近代史第一课            | / 301 |
| 一个谜底                   | / 303 |
| 一锤定音                   | / 306 |
| 猴子变人                   | / 309 |

## 二十九路军下级军官的一封信

虽然我是一个丘八,写不很好,但是我觉得在这时候我应当写写我所感觉到的,当下二十九路军是处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表面上好像我们是汉奸,因为我们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反倒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实在说起来,我还是个二十九路军的中级军官,而且在战场上干过很多年。我亲身参加过喜峰口(长城关口之一)抗日血战。我们确实表示了中华子孙的勇敢,于是很快地博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援助,赞扬与鼓励。现今二十九路军有了一个比较大的驻军地区,因而更大的保卫国家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了。当下我们站在北方的最前线,但是国内民众对于我们的感情,跟以往大不相同了。

我很知道假若我们现今担负起捍御国家与人民的责任来,我们将要得到中国人民的充分同情——比喜峰口抗战时,所表示给我们的,还要多千倍。但是我们的上级军官现在都成了大人物了。他们好似忘掉了我们士兵,对于我们的情绪一点也不在乎了,并且不肯与我们共患难了。所以二十九路军的名誉扫地了。我对这个非常地伤心。让我告诉你们叫我们伤心的我们队伍里边的事情吧:

一、平津的每个学生都是纯洁和天真的。他们成群的地城市与乡村中努力于为民族解放的宣传。这是中国人心未死的明证,并且是中国人不甘心当奴隶的一个极有力的证明。他们是民族的优秀儿童,并且将要担当起民族的艰难来。任何一个有微微爱国情感的人,都应当对这些学

生有真切的爱，而毫不踌躇地接受他们为民族解放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上级军官，逮捕与毒打他们。或者他们这样做，是在日本鬼子眼前夸耀他们的威风。但是这种牺牲我们青年兄弟姐妹的威风是什么东西呢？

二、我们的高级官长今天拜访北平，明天上天津，后天又上保定，并且他们走到哪里屁股后面老跟着一伙取媚卖笑的政客，人民说他们不是“安福系”，便是“政学系”。我也不晓得他们玩的什么把戏。但是他们中刘哲与王克敏的名字常见于报纸上。这些人是很有经验的日本汉奸，他们老是怂恿我们的高级官长投降日本。他们是中间人，经过他们，我们的高级官长和日本交互宴请。我们丘八们很惊讶，我们的高级官长想变作日帝的隶民。敌人已经打进我们的这里来了！在我们应当枪口瞄向他们的时候，他们竟和他们继续笑哈哈谈交情。我越写越生气。很明显的我们的高级官长有些太不顾忌自己的脸面。

三、如果那种拜访与宴请只是私人的应酬，也是极其可耻的。但不幸的是有许多征候，叫我们很惊讶日本或者是已经实在的变成我们高级官长的上司了，因为他们监视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例如学生运动，日本极其嫉恨，而我们的高级官长便用全力压迫它？红军的东征，他们宣言是在抗日，把日本吓坏了，可是我们高级官长立刻同意他们，称言“防共战线”必须成立。由我的眼光看来，中国人是中国人，日本鬼子是日本鬼子，在我们中间中国人不论是共产党与非共党，只若他们真正反对日本，我们就应当跟他们联合起来，作一抗日的殊死战。

四、近来无数的日本军队，（他们已经积极备战了）进占了我们的驻地，并声言他们要赶走二十九路军，把我们置在他们监视之下。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高级官长的态度是什么。但是我可以代表二十九路军的中级及下级军官与全体士兵说，我们宁作玉碎不为瓦全。我们誓不重蹈某某与商震军队的例子，而要坚持到底防御着国家的第一线，给中国军队作一个好榜样，而发泄我们的愤怒。

我要说明的是：我们是丘八，我们吸吮着人民的血汗生活。所以我们应当是“人民的军队”。我把这一句用括弧括起来，因为我们先前军官冯玉祥将军常常那样说。我们十分知道我们不是我们高级军官的奴

隶。他们的意志若是代表一天中国人民的意志,我们便支持一天,否则,他们若背叛了人民,他们必受处罚。

我写了这个,一切爱国分子将要知道我们二十九路军并不都是没有觉悟的混蛋。我们与人民共同受痛苦,而且我们要斗争。

摘自《中国呼声》1937年  
并以雋闻的笔名发表于1937年《文化》杂志



## 孔庆烈士生前谈冀东抗日大暴动

孔庆同志是河南光山县人,个子不高,童年就给地主佣工,十四岁参加红军游击队,长征中当营长。一九三七年冬调冀东发动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七月抗日大暴动时担任第四总队长的职务。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冀中第八军分区担任副司令员时牺牲在战斗岗位上。在他生前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向我讲述过他在冀东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故事,我曾经记录在日记里。今整理如下:

冀东的北面是山海关、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和长城东段,东面是京奉铁路、华北煤产基地开滦五矿和秦皇岛海港,南面是华北的工商业中心天津,西面是华北的政治中心北京。日寇由满洲调兵增援华北,要以冀东为跳板;中国收复东北,也要以冀东为跳板。再一说,冀东有高山,有平原,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党的工作基础深,民间蕴藏着的枪支多。因此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冀东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冬,冀东党组织以“冀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的统一战线名义,在冀东整个地区开展了工作,并且准备在长城喜峰口的南边,在遵化、迁安和丰润三县边界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活动。十一月间,省委叫我和也经过长征的李润民跟着省委的秘密交通员从天津化装到了遵化县境,找冀热边区特委会的军事部长高永祥同志(化名王平陆)接头。高永祥同志是迁安县上梨树峪人,在中东铁路上当过职工,受到十月革

命的影响,在一九三二年参加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在这一带曾经参加过组织过红军抗日游击队,拉起了一百五十多人。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政治影响很大。因此省委决定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冀东抗日游击第一支队,以高永祥为支队长,作为发动群众的旗帜。

高永祥同志估计一拉就可以拉起五六十人。但是一九三三年的那次起义拉起来以后被捕和牺牲了四十多同志,给当地党员和群众留下的惨痛印象太深了,因此这次重新起义集合人,只到了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是谁呢?特委高永祥、我、李润民、遵化县的县委、省委新派来的三个政治工作人员。其余的五个,有四个是县委巡视员和秘密交通站上的交通员。只有一个在一九三三年参加过热河孙永勤的抗日义勇军。武器也只有步枪一只、盒子枪一把、撸子手枪一把、大刀片四把,旗两面。后来又有党员送来两把撸子手枪。

因为人、枪集合的不如理想的多,有的同志就有点儿泄气,主张暂时先分散,等酝酿成熟了再集合。我和李润民是外乡人,口音不对,潜伏起来有困难。同时又是拿枪杆子出身的,对于抓枪杆子比隐蔽活动更熟悉,就主张不分散,用这十二个人做基础先拉起来,再逐步扩大。特委高永祥同志又从整个抗日形势和当地的工作情况考虑了一下,同意我们的主张。

集合地点在黑洼村万老明同志的家里。因为集合弄得目标很大,为了避免汉奸统治者的包围袭击,我们趁黑夜由滦河上游西岸,拉到遵化县城北、长城边的茅山上,找了个破庙“安营扎寨”。安排了一天的食宿和警戒问题,第二天就谋算着弄枪、扩大武装。我们十二个人分做两批,一批人留守“大本营”破庙,一批人出发活动。省委派来的政委史同志也是外乡人,又刚出学校门,就由他带着七个人留下看守破庙,同时也监视着庙里的和尚别给我们走了风声。留守同志把庙门一关插上,谁来喊叫也装听不见,只有我们回来用暗号打招呼才给开门。我们五个人,带着四支能用的长短枪。每人一支,还有一个徒手的。由高永祥同志领着出去活动。

冀东二十二县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就由日寇操纵着以“冀东防共自

治政府”的名义脱离了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冀东更成了日寇侵略军的后方基地，驻有汉奸保安队四个总队。各县又有伪警察和县保安队。日寇“顾问官”操纵一切军政大权。汉奸“自治政府”又勒令各村按摊派制度购买枪支，由土豪劣绅掌握着成立雇佣的“乡防共保卫团”和轮流值班的所谓“常备保卫团”。此外，大镇子的商户自立商团，各乡的大地主富户自购枪支、自雇“护院的”。冀东各处最小的村庄也有五六支枪支。我们呢，四支长短不同的破枪，而且子弹很少。因此只好化装活动。高永祥同志个子高大，身体很魁伟，又有件西装大氅，他就冒充遵化保安队的队长。我们冒充保安队的队员，说是下乡巡逻搜查土匪的，这样各村的“保卫团”就不敢惹了。

各村“保卫团”的枪是各个花户摊款购买的，硬收要引起全村人的反感。所以我们暂且不硬收。对于各村的“保卫团”也采取教育的方针。对于地主富农的私枪，本着“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精神，要他们拿出来抗日。要不然，我们就不能扩大。城北沙里村有一家地主有枪，当地同志早听见说过，于是成了我们第一个突击目标。可是这个地主防备很严，一见我们进村就关上大门了。房又高墙又厚，我们站在人家大门口外，干瞪眼没有办法。人家爬在房檐上问：“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遵化的稽查。”他们好像相信了，进一步问：“大部队上的吗？”我们说：“对，大部队上的。听说你们这里土匪闹得很凶，下乡来看看。”高永祥同志摆着“官架子”高声说：“赶快出来给我们带路，不要耽误了公事！”他是想骗地主开了大门好趁机闯进去。地主在房上说：“上团局子里去吧，那里有人支应着。”高永祥同志假装发脾气地说：“团局子在哪儿，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地面这么乱腾，你们村的乡团连个岗也不放，太不像话啦！赶快下来领着我们找他们去！”

高永祥同志这一唬把地主唬住了，有个老头赶忙下房给我们开开大门。大门一开，我就说：“喝碗水再走，怪渴的！”立刻闯进大门里。其余的同志也跟着闯了进去。老头感觉不妙，却也推不出我们，于是勉强笑着把我们领进有穿堂门的客厅里。一进客厅，有的同志说要喝茶，有的

同志说要吃饭,老头更觉得“来者不善”了,嘴里答应着,脸上变貌变色地不知道怎么好了。本地同志认识他,悄悄告诉我说:“这就是这家的当家人。”我性急,上前攥住他的手腕子说:“我们不是汉奸保安队,也不是土匪。我们是抗日游击队,我们要在敌人的后方建立一支强大的抗日队伍,配合正面的战争。可是我们缺少枪,只得向大家借用。”老头吓得直往后退,我又声明说:“我们不空拿你的枪,我们给你们写下收据,等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老头一连否认说:“我家是真没有枪,要是有了枪,拿出来给你们打日本是应该的。”我们善说不能,又怕拖的时间久了被敌人发觉包围住,就赶忙动手搜寻。

我们一共才五个人,大门口需要有一人站岗,看守地主和他的家眷也要一个人。动手搜寻枪支的,也就只剩下三个人。可是地主的宅院很大,房屋很多。三个人搜寻了半天,只搜寻出两只老毛瑟独出枪。地主老头一听是搜寻枪支打日本,口头上表现得很同情,因此使看守他的人对他发生了麻痹大意的心理,他再一见我们老搜寻不出好枪来,立刻扔下地主老头和他的家属,自己也动手搜寻起来。地主老头一见没有人再监视他,立刻带着全家人越墙逃走,报告保卫团去了。

我们抗日心切,找枪心切,也没有发觉地主老头已经逃走了,只是闷着脑袋在各屋里搜寻。搜寻了半天没有搜寻出好枪来,心想回头再问老头,老头更不会说有枪了,于是就从后门走出地主的宅院了。出后门不远,遇见一个老太婆,我们向她声明说:“我们并不是土匪,只是找枪打日本。刚才我们在这一家找枪的时候,发现他的炕洞里埋着很多现洋,我们没有动。请老大娘回去告诉他家的人,赶快见见数。要不然丢了,会埋怨我们!……”话还没有说完,保卫团追来了。我们喊话说:“我们是抗日的游击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保卫团不要当铁心汉奸!”并且利用这机会向他们宣传了一番抗日救国大道理。他们人数不多,经我们这样一争取,又见我们不跑不颠地很镇静,就没有敢开枪。可是我们往山里走,他们仍然在屁股后边盯梢。我们也没有开枪,在山边上对峙了一会儿,天黑以后就各奔各的路了。回到庙里,政委说:“哎呀,可吓坏你们了,你们一出去就是一整天!”他们在庙里平安无事地过了一天,好像

比我们还紧张。

第一次“出师”，基本上算不利。不利的原因是调查研究不够。

第二天，留守的人主张转移一下。昨天出门寻枪的我们，觉得怪累，故意再住一天。庙里的老和尚看着我们人、枪不多，又挺穷，住久了不仅影响他们的“香火”，而且还会给他招祸，就吓唬我们说：“南边离这里不满三里，有个大村庄，这个大村庄的乡团查道的时候，三天两头到这个庙里来玩。今天到日子啦，你们最好躲一躲。”我一听和尚的话起了火，说：“你不说这话，我们还在考虑是不是转移一下。你这么一说，我们非等不可了。保卫团既然给送枪来，我们要是走了，也显得没有点儿胆子了，还怎么打日本呢？”高永祥同志也主张等，于是我们从老和尚口中套话，研究查道乡团的活动规律，同时也把老和尚和小和尚都监视了起来。

和尚说他们的庙门常关着，我们也照习惯把庙门关上等候保卫团。傍晚时分，戴着大宽檐军帽，穿着黄色棉冬装的保卫团果然来到了。可是人数不多，只有三个人。不过，烧蓝全新的“三八枪”和沉甸甸的“九龙带”，我从门缝里一看到就眼馋了，心想：“送枪送子弹的来到了，把这两套家伙弄到手里，我们该是又一副心气啦！”

保卫团的三个人，一齐向庙门走来。肩膀上的“三八枪”都顶着子弹压着保险机。走在前边的一个上来扣门，跟在后边的两个扛着枪随随便便地站在旁边，不像有什么戒备。我们四个人藏在庙门后边，招手叫小和尚去开门，单等保卫团进门来从后边举枪把他们控制住。

小和尚开开庙门，三个团丁嬉皮笑脸地跟小和尚逗着嘴迈进庙门来就一直朝庙里走。我一使眼色，四个人一齐举起枪来呐喊道：“站住，不许动！”三个团丁果然吓得浑身一哆嗦不动了。伏在里院的同志们也都猛扑上来，下了他们的枪和子弹。

对于这三个团丁，都主张经过争取教育以后，把枪和子弹还原数给他们。我坚决主张没收他们的枪和子弹。我说：“这会儿你说什么好听的，人家也说你是土匪。只有拉起武装来，做出打日本的实事来了，人家才会相信你。再一说，咱们眼下的武器不够自卫的，一遇上敌人就有被歼灭的危险。自己被消灭了，还怎么谈得上争取别人！”大家还是主张

争取,不赞成没收。史政委并且说这就要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生了气,我说:“我是老粗,你们爱说啥就说啥,反正没有枪支、弹药,拉不起武装来!”钻进屋子里生闷气去了。他们一想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武器,真是说什么也不灵。三支步枪,三百多粒子弹,在当时对我们真不是一件小事!于是他们改变了主张,想争取这三个团丁连人带枪都留下参加我们的游击队。

经过百般争取,三个团丁坚决不肯留下参加我们的游击队,非要回自己的村庄不可。争取到快天黑了,仍然没有结果,高永祥同志最后说:“你们要是不肯参加我们的队伍也可以,人回去,枪留下借给我们抗日。”三个团丁在我们争取教育的阶段,认清了我们不是土匪,还看清了我们人、枪也不多,态度就强硬起来,枪支弹药也不肯借给用。我们再经过一番争取和教育,又给他们开下收据,打上“冀东抗日游击第一支队”的大关防,并且还给他们村的村长写了封借枪的信,强把枪支、弹药留下,打发三个团丁回村了。

三个团丁出了庙门往南走,我们也出庙门往北走,一走走出四十里,又转回黑洼万老明的家里。

黑洼在滦河西岸,隔河与高永祥同志老家的村庄梨树峪也近了。人熟地熟,活动更方便了。经过弄枪和下保卫团的枪两次小小的行动,高永祥同志也感到不迅速扩大队伍不行。扩大队伍,首先要有党的政治影响,同时也要有武器和经费的物质基础。长城口子清河沿的日伪税卡子无恶不作,长城内外的人带点东西串亲戚都要上税,还常常借搜查私货为名侮辱妇女,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于是高永祥同志决定先打清河沿伪税卡。在派人出探的时候,我们转到高永祥同志的家里做准备。他家在梨树峪的北头,靠山坡几间小平房,像是个下中农的家庭。他的兄弟是一九三三年拉红军抗日游击队失败后被国民党抓去,死在监牢的。他的父母双亲都还健壮。高永祥拉过他的十二岁的儿子介绍说:“认一认,这是叔叔,那是大伯。以后我要是不在家,他们来了好给他们烧水做饭。”又领着大伙到门口看看周围的地形和标志说:“你们要记住这个门口,一直进来就行了。”

高永祥同志当时有三十多岁，高个子，脸皮白白的，眼睛大大的挺有精神，嘴唇通红，说话不着急，有说有笑，叫人觉得非常亲切和热情。在当地农民群众里，在同志当中，都有很高的威信，真是一个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领袖。

日子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八年阳历一月一日，白天出探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清河沿关卡上，至多十几个人，只有七个鬼子。”我们一听敌伪关卡这般空虚，于是立刻乘夜出动去解决它。上梨树峪距离清河沿，至多有四五十里。大伙的热情特别高，脚底下像刮风，一气就跑到了。

清河沿税卡子有北屋五大间，北屋前边的厢房是个扣押漏税物资的大仓库。周围是高高的垣墙，大门正冲南开。大门洞旁边有个圆圆的碉堡。但是我们到前边一试探，碉堡里并没有岗哨。北屋呢，从大玻璃窗户里射出煤油灯的耀眼光芒。我们以为税卡子里的人还在赌钱或者坐夜。用叠罗汉的办法爬上垣墙仔细一观察，北屋里灯光虽然很亮，可是没有一点动静。我们估计敌人是张着灯睡着了。于是由我带着五个人下院子，先开开大门准备出路，同时也准备进屋扑灭敌人。高永祥同志带着几个人就爬上大仓库，打算居高临下地控制敌人。我们在院子里打开了大门，正想进北屋堵敌人的被窝，仓库上的同志向屋里开枪了。一连打了几枪，北屋里连点反应也没有。我们以为把敌人都打死在被窝里了，正想砸开北屋门搜枪，北屋里忽然“啪”的一声把灯灭了。房顶上和院里有一层白雪，北屋里的灯光一灭，立刻使敌人隐蔽在暗里，而使我们暴露在光亮处。接着我就听见北屋里的敌人一个个跳下床取枪，并且立刻朝外嘎嘎打起枪来。

我一听北屋的敌人并没有死绝，而且反击起来了，急忙砸门，准备带人猛扑进来，把敌人压下去。北屋的敌人见我们砸门，就集中火力打我们，压迫得我们不能动转。我很生气，想放火把北屋的敌人烧死。忽然又听见垣墙外边也响起猛烈的枪声。我一愣，正要问，仓库房顶上有同志说：“怎么东边也有敌人呢？”这时，我就听见高永祥同志决断地说：“那么，赶快撤出战斗！”接着我又听见高永祥同志向院里说：“老孔，你们赶快走，我掩护着！”我一听仓库房上的枪声又朝北屋里打起来，北屋

里敌人的枪声也转移到仓库房上了,我就带着院里的同志迅速从大门退到外边。我们退到大门外以后,正要掩护仓库房顶上的同志们退出战斗,忽然看见垣墙上跳下一个个人影向南跑去。我们以为仓库房顶上的同志都撤出战场了,也就立刻跟着往南转移。走了一截地,跑到前边的同志忽然回来向我说:“高永祥同志还没有下来呢!”我立刻急了,说:“赶快回去找!”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税卡和税卡东边的伪警察所(后来才弄清)里还一直往外打枪。我就估计高永祥同志仍然跟敌人对抗着。匍匐到大门前一看,高永祥同志果然是手里握着“三八枪”跟税卡上的敌人对抗着。可是他的小肚子上负了重伤,已经不能再动转。他显然是为了掩护大家撤出战斗有计划地留在后方,被敌人打中了小肚子。

我一看他负了重伤,立刻把他背起来,背出危险界。走出一里来地,碰见一个骑驴的小商人。我们要求借他的驴驮一驮高永祥同志。这个小商人坚决不肯。我们打了败仗,又伤了同志,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再见这个小商人这般不识大义,连可怜可怜人的心都没有,立刻掏枪逼着他把驴借给我们用一用。我们本来是想借用一下,叫他跟着我们一道走。他却假装去大便逃跑了。逃跑之后,据老百姓传说,他跑到日本税卡上去告密,企图邀功。可是鬼子说他是游击队的化装探子,把他吊起来打了个半死。

高永祥同志的伤很重,他的家目标太大,不能久住,就搬到他的姑姑家去养。因为没有及时得到医生治疗,伤口发炎,接着又浑身发高烧。高永祥同志不久就因重伤光荣牺牲了。

这次打清沿河伪税卡更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仍然是对敌情调查研究不够。在清河沿的税卡子东边还有个日伪警察所,我们事前不知道,所以腹背受敌,陷于被动。但是这次打税卡影响很大。长城内外的人都传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打过来了。怀念祖国的同胞更用夸大的言词渲染抗日游击队的威力,借以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

但是高永祥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损失太大了。高永祥同志是当地党的负责人,又是群众领袖。白色恐怖下的党组织为了防备敌人的百般破



坏,不发生横的联系,都用单线领导。高永祥同志一牺牲,这些组织就找不到了。同情分子更是凭着高永祥同志的社会关系联系,他一死,人们不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人家,关系也断了。这样,我们外乡人就像鱼离开水,一点活动办法也没有了。同时,经过这一次挫折,大伙的情绪又起了波动和分化。过去主张分散、不愿拉起来招目标的同志更有理了。省委派来的政委史某,口头上说得嘎嘣脆,要我们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他却一转身说是回天津找省委汇报工作,带着他带来的两个政治工作人员,一去没有回头。我们在当地已经打草惊蛇,汉奸保安队各处寻找我们,谣言也特别多。本地的同志见政委走了,也把枪一藏,回了自己的老家。我和李润民同志无家可归,就化装成卖篦子的小商贩。本钱还是本地同志从家里瞒着老人偷出来的。参加游击队的同志都是青年,在家不当家,在本村里又跟把持村政权的地主、富农水火不相容,他们回自己的家隐蔽还不牢靠呢,我们更不能去给他们扩大目标了。于是我们白天就借着卖篦子为名串村串集,晚上到腰带山上在看果树林子的窝铺里过夜。腰带山在遵化、迁安和丰润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的伪军和警察都不爱管,这才算给我们留下一个暂时能存在的空隙。

日伪的气焰越来越疯狂,反动的地主豪绅也更加嚣张起来。高永祥烈士的尸首埋在他姑家村的小山沟里,坏蛋分子报告给汉奸保安队,汉奸保安队就要挖坟扬尸。本地同志偷偷给我们送讯来告知这件事,我们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敌人对我们的烈士施行“尸刑”。于是星夜赶去,趁黑夜把烈士的尸体挖出,抬出十五六里地,才刨个深坑重新埋了。埋葬以后再不敢留坟头,只是记下一个暗号,准备抗日胜利以后隆重安葬。这时正是三九寒冬,地冻得像石头。连刨坑带抬尸体,可把我们累坏了,第二天在窝铺里整整睡了一天。

不久,特委书记李运昌同志来到,他听说高永祥同志牺牲了,非常悲痛,总结了一下第一次起义的经验教训以后,指定高振东(高存)、彭夫两同志召集本地区的党员重整旗鼓,又从铁路南的滦县、乐亭地区调来了十几个人。两路一共集合三十多人,十八条长短枪,游击第一支队就又拉起来了。先在长城以里活动,听说长城外敌伪统治了五年的热河地